

152/30

富阳文史资料

第二辑

富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富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编 辑 浙江省富阳县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 富阳印刷厂

内部发行

每册工本费: 1.10元

政协富阳县第二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蒋增福 **副主任：**鲁顺光

委员：郁加玲 赵和松 张全英

本辑编审：蒋增福 鲁顺光 陈礼君 朱岫云

封面设计：史庭荣

责任编辑：朱岫云

目 录

富阳县制沿革.....	(1)
先严蒋伯潜传略.....	蒋祖怡 (3)
章梅先先生传略.....	张 堃 (17)
朱邦彦及其《富阳县志洗》诸作.....	朱岫云 (22)
洪文瀾先生生平事略.....	孙振统 (29)
略述史说先生的事迹.....	俞永年 (36)
张学良将军二三事.....	傅立贤 (41)
回忆黄埔军校建校及建军概况.....	
.....	骆樞船遗作 (47)
盛世才大批财物遭劫案.....	孙仁山 (61)
我县宋殿村接受日军投降纪实.....	蒋增福 (65)
日寇八次流窜富春江纪略.....	许祺淦 (68)
我在创造社出版部.....	戴福年 (77)
金守先事略.....	奔 麇 (83)
国民党时期富阳县历任县长点名.....	编 者 (87)

富阳县制沿革

富阳县有三千多年的建置历史。《禹贡》为“扬州之域”，春秋时属越国，战国时属楚国，秦时属会稽郡，称富春，因富春江而得名。——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会稽郡领县二十有六，富春其一也。

西汉承秦之旧，设富春县，仍隶会稽郡，唯领地扩大，还包括今桐庐、建德，以及新登、分水、寿昌等地。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富春县改置侯国，由朝廷直接管辖。新莽时改名诛岁县，东汉建武初复名富春县，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后改属吴郡。

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以丹阳、会稽、吴三郡十县置东安郡，设治于富春。同年又分富春置新城县（即后来的新登）。七年，东安郡废，富春县仍属吴郡。在黄武年间，桐庐、建德、寿昌（当时叫新昌），也都从富春分出另建新县，故县境大为缩小。

东晋孝武太元十九（394年），为了避简文帝郑太后讳（名阿春），改称富阳县，富阳县名始此。

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年）十一月，侯景据富阳，曾于富阳置富春郡。侯景乱平后，复为富阳县。陈祯明元年（587年）以富阳、新登改属钱唐郡。

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并将新城并入钱唐县。大业三年（607年）改杭州为余杭郡，富阳

县仍为所属。大业十一年（615年）农民起义军首领楚王李子通率军渡淮，下江都，改富阳为桐州。大业十二年（616年）分钱唐复置新城县。唐武德四年（621年），李子通败亡，桐州复名富阳县，属杭州。武德七年（624年），并新城入富阳，永淳元年（682年）再置新城县。

五代时富阳和新城均属吴越国。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吴越王钱镠因回避梁太祖父朱诚名讳，改新城为新登；又因与吴王杨行密交恶，“耻闻逆姓”，于开平二年（908年）再改富阳为富春。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吴越国归宋，复改为富阳，并于第二年复改新登为新城。北宋时，富阳、新城属杭州；南宋时属临安府；元属杭州路；明、清两朝均属杭州府。

辛亥革命后，富阳、新登同属钱塘道。民国三年（1914年）复改新城县为新登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取消道制，两县直属于省。

1949年5月4日，富阳、新登先后解放，初属临安专区；1953年临安专区撤销，改为省直辖；1955年改属建德专区。1958年建德专区撤销，并新登入桐庐，属金华专区，富阳则改属杭州市。1960年9月，并富阳入桐庐，属杭州市。1961年底，于原富阳及新登地重置富阳县，仍属杭州市。县人民政府驻阳富镇，下辖富阳、新登、大源、场口、万市、灵桥、常绿、受降、常安、渚渚十镇和大源、场口、青云、新登、龙羊五区，四十二个乡。

朱岫云 整理

先严蒋伯潜传略

蒋祖怡

我的父亲蒋伯潜，名起龙，乳名尹耕，以字行；清光绪18年（公元1892年）诞生于浙江省富阳县新关村。我的祖父建侯公，名敬仲，乳名荔荪。父亲手撰《先考行述》一文中写道：

先考建侯公年十七举秀才。翌年乡试不售，乃慨然曰：“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曲学阿世，自好者弗为！”遂弃举子业，授徒于家。

我的祖母盛氏，系同邑上官村盛蕉亭公孙女，自幼丧父，与寡母同依蕉亭，蕉亭为林则徐及门弟子，任河北省灵寿县知县时，与其师林则徐同样地严禁鸦片，体恤民瘼，当时号为“河北第一清官”。先祖母时在任所，年十二，即娴剑术、好文墨。及长，与先祖父结婚后，常于庭中手持双剑，翩翩起舞；暇则夫妇对弈或吟诗唱和，直至我父亲诞生，先祖母以产后疾卧床，终至不起。

我的父亲继承了我祖父耿介拔俗、与我祖母仗侠好义的家风，又得到学校师长的熏陶和同学好友的影响，这对于他一生的行事出处有密切的关系。

在我祖父的严厉督导下，我父亲八岁即熟读《四书》，十三岁能背诵全部《十三经》。他六岁丧母，未及三年，继祖母来归。我父亲不见容于继祖母，又因家道中落，我祖父挽人介绍父亲到杭州开泰钱庄当学徒。那时名为“学徒”，

实即“奴仆”。我父亲性素强硬，忿而出走，流浪街头无所归。其时村中堂伯祖耐溪公见而怜之，叫他与其子伯弢同投考“杭州府中学堂”，并得录取入学，父亲由此得受中等教育。时为清光绪33年（公元1907年），父亲十六岁。

父亲在杭州府中学堂学习的情况，他同班同学、老友杨郁生世伯的话，最可概括。他说：“蒋君（指我父亲）在校，年纪最小，但却十分用功，寝室灯已灭，他还是一人在户外走廊上看书，直到半夜，所以每一学期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四年不例外。得到老师们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爱戴。”到辛亥革命那一年（公元1911年）终于以第一名毕业。时年二十岁。

时杭州府中学堂多名师，如钱家治、张宗祥、张相、钟毓龙，都是浙江耆宿，教育界名流。我父亲是他们的高足弟子，在他们的指导下，得益甚多。

是岁秋，先祖父为我父亲完婚，先母夏喜云来归。她是本邑里山叶家村夏任寒公的长女。任寒公，名慎庵，是清贡生，善饮酒，数觴不醉。每酒酣，健谈惊四座，他是夏灵峰先生族弟，但两人作风迥异。婚后次年，生子祖怡。

父亲中学毕业之后，因经济拮据，未能立即升学，在本邑紫阆村的阆苑小学（编者注：现划归诸暨县）、本村的美新小学任教，前后共四年。薪修所入，半以维持家用，半积以为日后升学之需。在此四年的暑假每年必投考、考则必中，先祖父素性谨慎，每次中后，均坚不允往。第四年（公元1915年）因考上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先祖父因此校不必缴纳伙食费，因而允许前往就读；父亲又得到他岳家的资助，遂离家北上。父亲的高足弟子张堃^①，曾回忆前尘

道：

那时，我正在美新小学读书。伯潜先生平时对待学生亲切和蔼，谈笑风生；但一上课堂，十分严肃认真。学生把誊清的作文本交上去，他当堂依次批改，等下课铃响，全班的作文也就批改完了。

第二年夏天，他离开美新小学，考上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我们就此分别了。当时，我心里有不胜依依之感。^③

父亲在北京高师四年学习的最后一年，是公元1919年，也正是“五四运动”的最高潮，北京高师和北京大学等学校又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他在诸名师如钱玄同、胡适、马叙伦、鲁迅等的熏陶下，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写了不少文章。北大图书馆藏书甚多，他经常去看书，与李大钊、毛润之等人相识，也多少受到一些他们的思想影响，因而他成为大学生中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宣传者。

就在这一年快近毕业的时候，我祖父建侯公患伤寒病，我父亲得信后兼道遄归侍奉。祖父旋即病故。父亲哀毁骨立，亲撰《祭父文》，辞甚沉痛，令人不忍卒读。安葬毕，仍回北京攻读。祖父既谢世，经济益趋困顿，父亲一方面投稿，一方面兼任《北京晚报》编辑，一直到大学毕业。其时，老家又遭回禄，“留余堂”故居巨宅化为灰烬，虽未伤人，而家道中落。

是年暑，父亲二十八岁，毕业于北京高师国文系。系主任陈宝泉先生因父亲成绩优异，打算留系为助教。父亲以祖父新丧，家中乏人照料，坚请回浙工作。陈乃将父亲介绍给

浙江大学校长^③蒋梦麟先生，蒋又转介入嘉兴省立第二中学任国文教员。

嘉兴省立二中校长是计宗型（仰先）先生，亦浙江的耆宿，于父亲为先辈，父亲以父执辈敬事之。在省立二中任教四年，为校长、同事们所钦敬，为莘莘学子所爱戴。从此，父亲历任浙江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杭州师范学校的教职，友人中如郑奠、胡伦清、邵裴子、宋云彬、夏承焘、陆维钊、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董任坚、徐旭东、章梅先等均属名流学者。他的高足弟子如冯雪峰、朱建新、张堃、王蕙、顾培怡等，亦为知名之士，与父亲终生有来往。由于他的交友广泛，同学、同事与学生众多，因而有“浙江名教师”之称。张堃先生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伯潜先生是我省中学的名教师。他常说：“教书是一种事业，若把它当做职业看，就成了“教书匠”了。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所以能以培养人才的百年大业为己任，教学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他教学的特点是：一、他虽则已具有语文方面广博而深湛的知识，备课工作仍很认真，不肯因为自己的熟练和应付裕如而轻率对待。二、上课时着重讲清字、词、句和篇章结构等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三、他常常指出：单靠课堂教学讲授几十篇范文是不够的，还必须指导学生们选读一定数量的课外读物以提高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和兴趣。四、对学生的作文，主张多批少改，以多批让学生知道自己写作的优缺点；那些应增应减，逐步达到内容妥贴，结构完美。换句话说，也就是用提高学生的认识来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逐步提高。由于这样，伯潜老师的改

作，他眉批和总批的字数，有时常常超过学生作文的本身。语文教师大都认为批改作业是一件苦事，认为这是无效劳动；而伯潜先生为了培养人才的目的，总是乐此不疲。他教了几十年中学，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苦于批改作文的话；这当然是跟他的学识渊博、笔性快有关，特别是和他明确的工作目标分不开的。

张堃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又说：

伯潜先生不但在课堂教学、作文批改认真负责，表现了“教不倦”的精神；对学生的思想倾向也很注意。当蒋家王朝独裁统治时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外寇疯狂入侵，国家民族危机严重。在此情况下，青年学生看不清前途的光明和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有的认为人生短促，一弹指就过去了，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有的则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敷衍态度，不能奋发向前。针对前一种思想情况，伯潜先生说：“有意义和没有意义，就看你怎样对待人生，正因为人生短促，光阴如驶，就应该抓住瞬息即逝的‘现在’、利用现在的积累，使自己学术上有所成就，事业上有所发挥；对人类有所贡献，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福利，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若轻视人生，忽视现在，因循苟且，坐废时日，学术无成，功业不就，空手而来，空手而去，这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了。”至于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说：“不应该把‘撞钟’只理解为消极被动地应付，而应该对此看做是和尚不容推卸的职分。不误时刻地撞好钟，这才称是“好和尚”。上自总统，下至平民，不论地位高低，都有他们自己应撞的钟。人人都把钟撞好，我们的国家民族也就有希望

了！”学生们听了他富有哲理的话，每能振奋精神，变消极为积极。

我父亲一生竭尽全力以赴的语文教学工作，可依抗日战争的先后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中学为主，后期则以大学为主，并围绕语文从事著述。前期工作中，除语文教学外，值得一提的，尚有下列三事：

（一）1924年上半年，新关村蒋氏决定重修宗谱，公推父亲为主编，父亲为了不负众望，毅然放弃这一学期的教学工作，就任宗谱的主编、并提出编辑人员名单，以他的堂弟文龙为辅。革旧厘新，多所建树，夜以继日，移晷忘倦。遇有意见龃龉者，父亲则坚持说服的原则，例如，他的《螟蛉辨》，即因是而作。凡七阅月，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蒋氏宗谱》的全部编撰、刻字、印刷工作。

（二）1925年，父亲与马叙伦先生，参与策动浙江省长夏超起义以响应国民军北伐。乘督军孙传芳和奉系军阀争夺苏、皖地盘之际，策动夏超出兵，从背后攻击孙传芳，把他赶走，以迎接正在北伐的国民军。后因事机不密，夏超被杀而宣告失败。

（三）1927年，北伐军底定浙江后，马叙伦先生出任浙江省府委员兼民政所长，我父亲任《三五日报》主笔。凡有《社论》，他必亲自秉笔，针砭社会利弊，剖析政情，读者称之。未及一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马叙伦先生辞去本兼各职，父亲亦愤而辞去主笔职务，仍从事教育工作。嗣后每次谈起黑暗统治，他总是义形于色，愤愤不平。

公元1937年，父亲四十岁。日本侵略军在浙江金山卫登

陆、直指杭州。我家才由杭州安吉路寓所迁回故里。旋杭州及富阳县城先后陷落，敌骑时欲渡钱塘江南犯，一夕数惊。不得已到本邑神功山张莖先生家避难。父亲先师章敏先生师母及邵裴子先生两家，亦相与俱往。此时父亲的老友蔡丐因先生在世界书局任总编辑，亟招父亲赴沪工作，并寄惠资斧，乃在春节后，与邵裴子先生一家、父亲的异母弟仲超一家，自萧山买舟，经绍兴、曹娥等地到宁波，转乘海轮到沪。由钱家治先生代赁其岳家间壁的愚园路一幢住宅，与叔父一家合居。复由父亲同学董任坚先生、周予同先生的介绍，在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无锡国专文学系任教授，同时，也在上海世界书局任特约编审。

到上海后不较，父亲听说郁华曼陀先生在上海法院当庭长，他和曼陀先生曾在北京相识，这位同乡先辈的道德学问，是父亲所素仰的，当时就打听郁先生在法租界的地址，带我同去拜访。

到了这年的秋天，一位在郁家当家庭教师的亲戚、气急败坏地跑来告诉我们曼陀老先生遇刺的噩耗：有一个替日本人为虎作伥的汉奸，专门欺压同胞、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法院依法判处此人的死刑。之后，郁老先生接二连三地收到恐赫信，要求减刑，而郁老先生却置之不理，又提前执行了这罪犯的死刑。

父亲探听到要在法租界里举行郁老先生的追悼会的地点和时间，坚决要去参加，并且嘱我同去。会场里坐满了人，大家对这位为国家民族献身殉国的人，用沉默来表示他们深刻的悲悼，会议开始后不久，我父亲上台讲话，对日本侵略和汉奸们的残暴、咬牙切齿，对郁老先生的仗义身殉，表示

十分崇仰，对郁老先生的遇害，表示异常沉痛。我边上有位素不相识的人，低声说：“会场里一定有奸细，回去路上要小心！”

不久，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这次开会的情况，同时，也摘要报道了父亲的讲话。

上海世界书局约父亲写一本关于经学的著作，他答应了，还打算和大夏大学所教的《十三经概论》课结合起来，出版后可以作为学习此课的必读书籍。于是经常阅读经书，阅读评论经学的参考书，一直到深夜。当时，我有这样的思想：父亲对《十三经》早已会背，现在又在开这门课，再要费这么大的劲道干什么？但是不敢讲出来。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父亲环顾室内无人，先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楚辞集注》来，这是近人的著作，作者在当时是颇有点名气的，父亲指报这书上的几句标点：“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注者把“高平曰”三字，作为一句，在“曰”下加了冒号。在“高平”边上又加上一个私名号，余下来的又是一句。父亲恳切对我说：“这位标点人，我相信他的学力、见识，是能够把这十个字，准确无误地标点句读的，他所造成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轻敌”。古人说：‘狮子搏兔，犹用全力。’无论是教学或是著作、都得为莘莘学子着想，要为他们负责，决不可掉以轻心啊！”他这番话，明明是对我的针砭。我做事常易草率，从此以后，经常自己警惕！（《十三经概论》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此书解放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现已两度重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冲入租界，书局、学校，纷纷内迁。父亲坚持不愿做顺民，早已打算离开

上海，但往何处难定，故尔躊躇，这时，老家转来朱自清先生从昆明来信，要父亲到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于是，归志遂决，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工作，于1942年四月一日成行。

不料出门第一步就遇到严重的挫折。进火车站要在入口处经日本宪兵的严密检查，藏在我母亲衣袖中的一部《校勘目录学》稿本（是准备到西南联大用的）被日本宪兵抄了出来，他们要把我母亲逮捕，这时候，我父亲挺身而出，说这稿件是他的；我也挺身而出说是我写的。日本宪兵们就把母亲放了，把我们父子二人拖到车站地下室里，严刑拷问，一定要我们承认是共产党。我们任凭折磨，不吭一声，父亲瞪目怒视，挺身受刑，我则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这样受摧残折磨经两昼夜，由于上海亲友的营救，我们终于负伤出狱。

到了杭州，住众安桥章铤先生师母家井字楼，其地在《东南日报》馆后边，杭州沦陷后，这里是日本的“宪兵司令部”，几乎每夜都发出被难同胞在酷刑下的呻吟声，令人发指。

这时，日本侵略者正在发动进占金华，从杭州运兵，因而杭富公路一度阻塞，幸得同乡人的帮助，好容易搭上杭富路汽车；在日本宪兵的监视下，到凌家桥下车，辗转到钱塘周家浦我母亲的外婆家。——这里也是敌占区，再渡钱塘江向南，便是国统区我们的老家了。

但是，这一江之隔，不啻天堑。日本兵在江边搭起一道竹篱笆，上面挂着：“私越此篱笆者，格杀勿论”的木牌子，据说也被杀害过不少人。

我们和亲戚商议渡江的事，经过周密计划，选定在一个

月底的半夜，由亲戚找到一条小船，从篱笆到江边，还有一段野草遍地的路；我们一家和带路护送我们的亲戚爬到江边，同乘小船向江南进发，当时伸手不见五指，唯见一道道划破天空的探照灯在江面上移动。然后，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向往之情，使我们增加了勇气，当时毫无畏惧之心。

到了老家，才知道金华、南昌均已陷落，西南道阻，而一家衣食堪虞。幸得幸友以现金或粮食相接济，始得勉强过去。后来与重庆正中书局订立了编辑合同，有稿费收入，父亲也收受了几名亲戚子弟，为他们补习功课，我与妻子也找到了工作。

这时，在浙东的“英士大学”、省通志馆中的父亲老友，都先后来聘请。父亲坚守西南联大之约，对他们一一婉谢，闭门撰述。时为1943年，父亲五十二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董任坚先生出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派其秘书为代表到我老家坚邀父亲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授。父亲感其诚，乃只身由我伴送赴沪就职。董先生同学情深，为了照顾父亲的起居、饮食，坚留父亲在他寓中住宿，一直到次年春天，我们全家都到上海，方才允许父亲到新绿村和我们一同居住。

父亲在上海师专中文系，既主持系务、又任教学工作，并围绕其讲课“诸子”的内容、撰述《诸子通考》一书。其书最主要特色是：以孔子为最早之“子”，以《论语》为我国最早的“子书”。（此书1948年由上海正中书局印行，解放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版。）此稿完竣后，又编成《诸子索引》一书。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紧准备内战，开明人士和学

者，或遭受政治迫害，或遭受经济威胁。沈自敏^④在他的《姨丈蒋伯潜二、三事》^⑤一文中写道：

“我当时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回到浙江家乡探望亲友，因为我们姊弟两人从小失去父母，依伯潜姨丈过活，祖怡表哥又是我的姊夫，就到上海新绿村住了半年多。这时，内战一触即发，形势非常危急，特别是北方平、津一带。那时我准备到北平（京）去工作。姨丈不忍我和他分开远别，八年离乱，亲友难逢，这种心情，我是充分理解的。那时，姨丈总是呆呆地凝视着我，欲言不语。及至他的老友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他的积愤一下子如山洪爆发，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的盛怒：他热泪满眶，拍案而起，把《诸子索引》稿子全部推在地下，喊道：“这捞什子！——你上北平去吧！”

1946年，童任坚先生因触犯国民党某要人而被解职，父亲激于义愤，也坚决离沪返杭。时陈仪主浙政，坚请出任杭州师范校长，父亲效法蔡元培先生办北京大学之风，延聘进步教师共商校务，此时杭师进步空气甚为浓厚，但未及半年，陈仪主席离浙赴台湾。父亲目睹时艰，又愤而辞职，时年五十七岁。

解放前夕，物价一日三涨，民不聊生。我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所入不足维持一家生活。父亲信心百倍，率领一家人节衣缩食，共度时艰。迨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一家额手相庆。

解放后，父亲任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此后连任省市人民代表，直至谢世。并应其师张宗祥先生之请，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创业伊始，百废待兴。父亲率我母亲居